

消费替代还是信任补偿? *

——转移支付收入对农民公共品供给意愿的影响研究

□黄祖辉 王雨祥 刘炎周 胡伟斌

摘要:中国农村转移支付日渐增加,但公共品供给不足问题依然严重。首先,本文构建了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引入消费替代效应与信任补偿效应两个机制来解释转移支付对农民公共品供给参与的影响,并发现它们的影响在不同转移支付强度下具有异质性。之后,利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政策特点,采用RD-IV识别策略估计了转移支付收入对农民公共品供给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农民获得的转移支付收入每提高1000元,其愿意供给公共品的概率平均提升约16%,且在当前转移支付力度下,该促进效果主要通过信任补偿机制发挥作用。上述结论表明,国家加大对农民的转移支付力度,乡村注重培育互助互信的干群关系,对形成完善的农村公共品多元供给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转移支付 公共品供给 消费替代 信任补偿

DOI:10.19744/j.cnki.11-1235/f.2020.0140

一、引言

21世纪以来,我国政府的“三农”投入不断增加,2003年,中央财政“三农”支出为2144.16亿元,而2013年,中央财政“三农”支出已增长到13799亿元^①。完善农村公共品供给作为提升农民生活水平与促进农村繁荣发展的重要手段,占据财政“三农”支出的重要比例。然而,在对农村公共品自上而下的公共支出力度如此大的情况下,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依然普遍严重不足(李燕凌,2016)。究其原因,政府主导供给农村公共品的模式忽视了社会多元参与对解决公共品筹资问题、实现公共品供求匹配的积极作用,因而供给绩效不尽如人意(林万龙,2007;沈坤荣、张璟,2007;郁建兴、高翔,2009;范逢春、李晓梅,2014)。因此,本文将从农民公共品供给意愿出发来自下而上地研究和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问题。

农民作为公共品供给的直接受益者和重要参与者,从提升农民公共品自主供给意愿的角度来研究解决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然而现实中,农民一方面受限于收入水平较低而缺乏分摊公共品供给费用的能力(马晓河、方松海,2005),另一方面受限于乡村人情信任瓦解而丧失承担公共品供给责任的积极性(周生春、汪杰贵,2012)。近些年,随着国家对农民民生保障的重视程度逐渐提升,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城乡居民统一医疗保险制度以及低保制度等社会保障制度相继落实并推广,农民获得的转移支付收入不断增加。在此情形下,农民获得的转移支付收入既提升了农民的收入水平从而放松了农民自愿供给公共品的能力约束(消费替代效应),又提升了农民对村两委的信任程度^②从而放松了农民自愿供给公共品的积极性约束(信任补偿效应),因而可能最终提高农民的公共品供给意愿。

从消费理论来看,公共品作为一种正常商品,收入的提升可能会使得农民私人物品消费的边际效用不断递减因而最终更偏好供给并消费公共品,即用公共物品消费替代了私人物品消费,这是从理性人效用最大化角度出发能够直接推断出的结论,是农民作为“经济人”属

*本研究感谢教育部基地“十三五”重大项目“城乡发展一体化背景下的新型农村建设与治理研究”(16JJD790053)的资助。刘炎周为本文通讯作者。

性的重要体现,因此我们必然需要关注消费替代效应。而从信任这种社会资本的角度出发来关注信任补偿效应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理论方面,Olson(1965)的开创性研究提出了公共品供给的“集体行动问题”,后续相关理论研究则发现,社会资本有利于解决“集体行动问题”,促进公共品供给(Arrow, 1972; Coleman, 1990; Putnam, 1993)。Guiso等(2010)也指出,经济学家通常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系列能够促进合作与克服‘搭便车’问题的信念”。村干部在向村民告知转移支付信息、发放转移支付款项的过程中,村民积累了对村干部的信任这一社会资本。我们认为,这种信任会补偿原本由于“搭便车”心理造成的公共品供给意愿不足。实证方面,关于中国农村的实证研究指出,社会资本有助于解决公共品供给中的集体行动问题从而提升村庄的公共品供给水平(Tsai, 2007; Xu and Yao, 2015)。但他们的社会资本均是指宗教或宗族力量,而且他们的研究聚焦于村庄层面的公共品供给;而本文则从农民个体层面出发,研究信任这一社会资本对于解决公共品供给中“搭便车”现象的作用。最后,出于研究的完备性,信任这一社会资本能够对农民公共品供给意愿产生作用也是农民“社会人”属性的重要体现,这与消费替代效应中农民的“经济人”属性相互对应。

因而,在农民转移支付收入不断提升的背景下,本文主要研究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农民获得的转移支付收入是否会提升农民的公共品供给意愿?第二,农民的转移支付收入提升是通过何种机制促进其公共品供给意愿的?本文首先构建一个简单的农民跨期决策理论模型,从理论上论证在不同的转移支付额度下,以上两个问题的答案会有所不同。然后利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这一政策,构造断点回归结合工具变量(RD-IV)的识别策略,实证检验了理论预测,并估计了农民转移支付收入对农民公共品供给意愿的影响效应的大小。研究发现,农民的转移支付收入每提升1000元,其愿意参与公共品供给的概率平均上升约16%,且该促进效应主要通过信任补偿机制实现。

理论层面,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挖掘转移支付对农民参与公共品供给的影响机理,同时通过实证分析给出了推论的现实证据,并从因果层面上对不同影响机理的强弱程度进行了挖掘,丰富了农村公共品供给在微观层面的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现实层面,本文的研究连接了农村转移支付和村庄公共品供给这两个重要议题,研究结论对于探讨和解决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背景下,村庄公共品有效供给不足这一问题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本文其余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顾已有文献研究;第三部分给出一个简单的理论框架;第四部分讨论数据来源、变量设置及识别策略;第五部分报告实证结果;最后一部分为结论性评述。

二、文献回顾

关于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因素,已有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在理论方面,已有研究分别从社会精英阶层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限制官员权力的角度,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民主化对国家公共品供给的影响(Acemoglu and Robinson, 2001; Lizzieri and Persico, 2001)。Bardhan和Mookherjee(2006)则从地方官员负责性的角度,研究了权力下放对地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在实证方面,国外已有文献研究了官员身份特点(Chattopadhyay and Duflo, 2004; Besley et al., 2004)、族群分化(Miguel and Gugerty, 2005)、农村团体(Tsai, 2007)、审计监督(Olken, 2007; Bjorkman and Svensson, 2009)和官员连任动机(Janvry et al., 2012)对村庄公共品供给的影响。

此外,直接探讨转移支付影响公共品供给的文献也比较丰富。绝大部分文献研究了转移支付对公共品供给水平的影响以及影响机制。Oates(1972)发现,当存在地区间转移支付时,各地政府为了吸引资本、技术等要素流入,会增加对当地公共品支出投入。Baretti等(2002)则从另一种视角出发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发现,由于转移支付与地方税收之间构成直接的成本替代,因而可能抑制地方供给公共品。Shih等(2005)部分研究发现,地方各级政府都倾向于尽可能多地占有财政收入并将支出责任推至下级政府,他们会把对下转移支付维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这意味着转移支付对提升地方公共品供给基本没有帮助。可以发现,由于从宏观层面研究转移支付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具有多重复杂性,已有研究关于转移支付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尚无定论。因此,一部分文献则转而关注转移支付制度,指出转移支付能否促进公共品供给,关键取决于转移支付

的制度设计。已有研究发现,如果设计得当,转移支付可以激励地方政府的负责性,增加本地居民的社会性公共品供给(Bucovetsky and Smart, 2006; Hindriks et al., 2008; Weingast, 2009)。Allers(2012)也发现,良好的转移支付制度可以消除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有助于在各地区间更有效地配置公共品。与之相对的,Ivanyina(2010)则发现,如果转移支付仅被用来补偿地方政府的财政缺口,反而会抑制地方政府的公共品供给激励。

实证层面上,国内学者主要从省级层面对转移支付是否影响各地区总体公共品供给水平进行了大量研究。已有研究均发现,转移支付会促进地方公共品供给水平(范子英、张军,2013; 亓寿伟、胡洪曙,2015; 赵永辉、付文林,2017)。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文献研究了转移支付对各地区内部不同类型公共品供给的结构性影响。郭庆旺和贾俊雪(2008)发现,中央转移支付有助于促进各地区医疗卫生和交通设施的改善,但对基础教育则不具有显著影响。傅勇(2010)发现,中央转移支付促进了社会性公共品的供给,该结论与Hines和Thaler(1995)的研究一致。李永友和张子楠(2017)在考虑了地区间的竞争后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发现,由于地方官员面临考核压力与晋升的“锦标赛”,转移支付反而降低了地方政府供给社会性公共品的激励。此外,转移支付在理论上有助于改善地区间财力均等化水平,并促进各地区公共品供给收敛(Bowdway and Shah, 2007),但国内关于转移支付对不同地区之间公共品供给均等化影响的实证研究并不支持该结论(谢垚,2007; 赵永辉、付文林,2017)。其中谢垚(2007)发现税收返回对各地的公共品差距扩大起了强化作用;赵永辉和付文林(2017)则发现转移支付并未显著对缩小地区之间的公共品供给差距。

从现有研究看,由于我国公共品供给体制中自上而下的财政投入仍然占据主导,所以绝大部分文献从省级层面研究了各省获得的转移支付对地区公共品供给的影响。但一方面,由于省级层面公共品供给研究具有太多的决定因素和混杂因素,因而从微观层面对转移支付和公共品供给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识别,有助于得出更为可靠的结论。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多元主体特征,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城市公共品供给具有很大异质性,而忽略这一异质性,特别是忽视作为农村公共品的直接受益者和重要参与者的农民在公共品供给中可能发挥的作用,直接照搬现有文献对于城市公共品供给的研究结论,则不具备可靠的政策参考性,但现有文献对农民个体层面公共品供给意愿的有效讨论比较匮乏。另外,受限于省级层面的宏观研究视角,既有文献大多笼统地探讨转移支付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而较少系统地挖掘当中的作用机制。范子英和张军(2013)的研究是为数不多讨论转移支付影响公共品供给作用机制的文献,但他们对机制的讨论仅限于理论推理,而缺少严谨的实证分析。因此,本文从农民层面的微观视角出发,研究微观农民主体获得的转移支付收入对其公共品供给意愿的影响,有助于解释当前农村层面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进而推动农村公共品有效供给。同时,得益于转移支付收入的特殊性,我们不仅可以探讨传统消费理论框架下的消费替代效应,也进一步探讨了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的信任补偿效应,并基于微观数据对这两种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

三、理论框架

本部分将刻画农民转移支付收入影响农民公共品供给意愿的理论机制,从而分解出转移支付促进农民公共品供给意愿是因为纯粹的收入增加,还是因为增强了村民对村干部的信任。我们在一个不包含储蓄决策^③的两期模型中讨论该问题。在第一期中,农民获得外生给定的收入 y_1 和转移支付 T_{1t} ^④,决定是否参与当期公共品供给 $I=\{0,1\}$ 并同时确定当期消费 c_1 ,若参与公共品供给,则支付“份子钱” $\bar{R}$;在第二期中,农民同样取得给定的收入 y_2 ,另外为更贴近本研究的实证部分,转移支付采取养老金的形式,即农民在第二期得到转移支付 T_2 。

一般化地,农民终生效用为时间可分形式,即 $u(c_1, c_2, g) = u(c_1, g) + \beta u(c_2, g)$,其中 β 为跨期贴现因子, g 为公共物品消费量^⑤,第一期公共品存量 g_0 标准化为0。任一期效用函数关于私人消费与公共消费的边际效用均为正且私人消费的边际效用递减,即 $\partial u(c, g)/\partial c > 0$ 且 $\partial^2 u(c, g)/\partial c^2 < 0$ 。

基于公共品供给的实际情况,考虑农村公共品供给分为两个阶段:(1)村两委出面号召农民集资进行村庄公共品建设,若集资失败,则在第二期仅能获得补偿性的最低公共品增量 Δg ,若集资成功则进入(2)阶段。显

然,农民个人的参与并不能完全决定集资是否成功,对其个人而言,若参与供给则集资成功概率为 p_1 ,否则为 p_0 ,显然有 $1 > p_1 > p_0 > 0$ 。注意到,即使农民个人不参与供给,仍然有正的概率 p_0 享受公共品建设成果,且即使以 $1-p_0$ 的概率集资失败,其仍然可以获得补偿性的公共品增量 Δg ,这反映出农民存在“搭便车”动机。(2)若进入到公共品建设阶段,则对农民个人而言,第二期取得的期望效用为 $E[u(c_2, \Delta g)|\delta] = \int_{\Delta g}^{\Delta \bar{g}} u(c_2, \Delta g) f(\Delta g, \delta) d\Delta g$,其中 Δg 为第二期的公共品增量,对集资决策期的农民而言是一个随机变量,其密度函数为 $f(\Delta g, \delta)$,而 δ 刻画了农民对村委会工作的信任程度,假设:对任意 $d\delta > 0$, $f(\Delta g, \delta + d\delta)$ 一阶随机优于 $f(\Delta g, \delta)$,即 $\frac{\partial E[u(c_2, \Delta g)|\delta]}{\partial \delta} = \frac{\partial \int_{\Delta g}^{\Delta \bar{g}} u(c_2, \Delta g) f(\Delta g, \delta) d\Delta g}{\partial \delta} > 0$,基于以上设定进行后续分析。

(一)转移支付收入对农民公共品供给意愿的消费替代效应

首先考虑一种反事实情形,我们分离出转移支付对农民的政府信任方面的影响,仅将 T_{r1} ($T_{r1} \geq 0$)作为一种彩票收入,此时农民政府信任为常数 δ_0 ,期望效用最大化问题可以如下表述^⑥:

$$\max_I u(c_1, 0) + \beta [p_1 E[u(c_2, \Delta g)|\delta_0] + (1-p_1)u(c_2, \Delta \underline{g})] \quad (1)$$

$$\text{s.t. } c_1 + \bar{R} \times I = y_1 + T_{r1} \quad (2)$$

$$c_2 = y_2 + T_{r2} \quad (3)$$

将(2)、(3)式代入(1)式,并整理可以得到:

$$\Delta \bar{V}(T_{r1}) = \Delta \bar{u} + \beta \Delta p [E[u(y_2 + T_{r2}, \Delta g)|\delta_0] - u(y_2 + T_{r2}, \Delta \underline{g})] \quad (4)$$

其中, $\Delta \bar{u} = u(y_1 + T_{r1} - \bar{R}, 0) - u(y_1 + T_{r1}, 0) < 0$, $\Delta p = p_1 - p_0 > 0$ 而 $\Delta \bar{V}(T_{r1}) = \bar{V}(I=1) - \bar{V}(I=0)$, 其中 $\bar{V}(I=1)$ 为仅考虑消费替代效应时农民参与公共品供给的期望间接效用函数, $\bar{V}(I=0)$ 反之。记 ΔV_0 为未获得任何首期转移支付时的间接效用之差,考虑农民此时不愿意参与公共品供给的情况 $\Delta V_0 = \Delta \bar{V}(0) < 0$, 那么由 $\partial u^2(c, g)/\partial c^2 < 0$ 可得:

$$\frac{\partial \Delta \bar{V}(T_{r1})}{\partial T_{r1}} = \frac{\partial u(y_1 + T_{r1} - \bar{R}, 0)}{\partial c_1} - \frac{\partial u(y_1 + T_{r1}, 0)}{\partial c_1} > 0 \quad (5)$$

于是有如下命题。

命题1:必然存在一个 T_{r1}^* 使得 $\Delta \bar{V}(T_{r1}^*)=0$,当转移支付大到满足 $T_{r1} > T_{r1}^*$ 时,即使在仅考虑消费替代效应时,转移支付 T_{r1} 也会提高农民参与公共品供给的意愿。原因在于农民收入提高带来私人消费 c_1 的提高,当 T_{r1} 高于 T_{r1}^* 从而 $\Delta \bar{V}(T_{r1}) > 0$ 时,由于私人消费的边际效用递减,此时增加 $\Delta c = \bar{R}$ 的私人消费所带来的效用增量,已经小于农民将 $\bar{R}$ 用于参与公共品供给所带来的期望效用增量,故其将放弃“搭便车”而参与公共品供给。

(二)转移支付收入对农民公共品供给意愿的信任补偿效应

考虑另一种反事实情形,分离出第一期转移支付收入对农民消费方面的影响,仅将 T_{r1} ($T_{r1} \geq 0$)作为一种增进农民对村两委信任感的来源,即转移支付也将提高村民对于村两委的信任与满意程度,这将从另一个机制促进农民公共品供给意愿。此时农民村两委信任度为关于转移支付 T_{r1} 的单调增函数 $\delta(T_{r1})$ ($\delta'(T_{r1}) > 0$),显然有 $\delta(0) = \delta_0$,则期望效用最大化问题如下:

$$\max_I u(c_1, 0) + \beta [p_1 E[u(c_2, \Delta g)|\delta(T_{r1})] + (1-p_1)u(c_2, \Delta \underline{g})] \quad (6)$$

$$\text{s.t. } c_1 + \bar{R} \times I = y_1 \quad (7)$$

$$c_2 = y_2 + T_{r2} \quad (8)$$

将(7)、(8)式代入(6)式整理得:

$$\Delta \hat{V}(T_{r1}) = \Delta \hat{u} + \beta \Delta p [E[u(y_2 + T_{r2}, \Delta g)|\delta(T_{r1})] - u(y_2 + T_{r2}, \Delta \underline{g})] \quad (9)$$

其中, $\Delta \hat{u} = u(y_1 - \bar{R}, 0) - u(y_1, 0) < 0$, 而 $\Delta \hat{V}(T_{r1}) = \hat{V}(I=1) - \hat{V}(I=0)$, 其中 $\hat{V}(I=0)$ 为仅考虑信任补偿效应时农民参与公共品供给的期望间接效用函数, $\hat{V}(I=0)$ 反之。易知:

$$\frac{\partial \Delta \hat{V}(T_{r1})}{\partial T_{r1}} = \beta \Delta p \frac{\partial E[u(y_2 + T_{r2}, \Delta g)|\delta(T_{r1})]}{\partial \delta} \delta'(T_{r1}) > 0 \quad (10)$$

由于 $\Delta \hat{V}(0) = \Delta V_0 < 0$, 则有如下命题。

命题2:必然存在一个 T_{r1}^{**} 使 $\Delta\hat{V}(T_{r1}^{**})=0$,当转移支付满足 $T_{r1}>T_{r1}^{**}$ 时,即使在仅考虑信任补偿效应时,转移支付 T_{r1} 也会提高农民参与公共品供给的意愿,因随着 T_{r1} 的提高,农民对村委信任与满意的提高增加了其参与公共品供给的期望效用。

(三)转移支付收入对农民公共品供给意愿的复合效应

下面考虑现实情景,农民期望效用最大化问题同(6)式,但其余约束条件同(2)、(3)式,将(2)、(3)式代入(6)式并整理可得:

$$\Delta\tilde{V}(T_{r1})=\bar{\Delta u}+\beta\Delta p[E[u(y_2+T_{r2},\Delta g)\delta(T_{r1})]-u(y_2+T_{r2},\Delta g)] \quad (11)$$

其中, $\Delta\tilde{V}(T_{r1})=\tilde{V}(I=1)-\tilde{V}(I=0)$,而 $\tilde{V}(I=1)$ 为现实情况下农民参与公共品供给的期望间接效用函数, $\tilde{V}(I=0)$ 类似。记 $\Delta Trust=\Delta\tilde{V}(T_{r1})-\Delta\bar{V}(T_{r1})$,则对任意 $T_{r1}\neq 0$,我们有:

$$\Delta Trust=\beta\Delta p[E[u(y_2+T_{r2},\Delta g)\delta(T_{r1})]-E[u(y_2+T_{r2},\Delta g)\delta_0]]>0 \quad (12)$$

于是验证:

$$\Delta\bar{V}(0)=\Delta\hat{V}(0)=\Delta\tilde{V}(0)=\Delta V_0<0 \quad (13)$$

$$\Delta\tilde{V}(T_{r1}^*)=\Delta\bar{V}(T_{r1}^*)+\Delta Trust=\Delta Trust>0 \quad (14)$$

由于 $\Delta\tilde{V}(T_{r1})$ 关于 T_{r1} 是连续的,则必然存在 $0<T_{r1}^{***}<T_{r1}^*$ 使得 $\Delta\tilde{V}(T_{r1}^{***})=0$,同理可证 $0<T_{r1}^{***}<T_{r1}^{**}$,但我们并不知道消费替代效应与信任补偿效应的相对强弱,即未知 T_{r1}^* 与 T_{r1}^{**} 的关系。假设 $T_{r1}^*>T_{r1}^{**}$,即信任补偿效应对于促进农民的公共品供给意愿有更大的帮助,关于这一点,将在后文的实证研究中进行检验并得到验证,于是有 $0<T_{r1}^{***}<T_{r1}^{**}<T_{r1}^*$,综上所述(示意如图1)。

命题3:平均而言,若当前针对农民的平均真实转移支付收入 $T_{r1}\in(0,T_{r1}^{***})$,则我们将观测不到转移支付对农民公共品供给意愿的促进效应;若平均真实转移支付收入 $T_{r1}\in(T_{r1}^{***},T_{r1}^{**})$,则我们将观测到转移支付对农民公共品供给意愿的促进效应;若平均真实转移支付收入 $T_{r1}\in(T_{r1}^{**},T_{r1}^*)$,我们不仅能观测到转移支付对农民公共品供给意愿的促进效应,且即使控制了消费替代效应后, T_{r1} 的提高仍将通过信任补偿效应提高农民的公共品供给意愿;若平均真实转移支付收入 $T_{r1}\in(T_{r1}^*,+\infty)$,我们不仅能观测到转移支付对农民公共品供给意愿的促进效应,且不论控制消费还是信任补偿效应后, T_{r1} 的提高仍将通过另一效应提高农民的公共品供给意愿。

四、数据来源与识别策略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与治理调查(下简称“农村治理调查”)2018年开展的全国基础调查。农村治理调查是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CARD)于2018年主导的一次全国家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农村地区15岁以上的居民,调查样本分布在全国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87个村,共计1657人。使用农村治理调查数据研究转移支付收入对农民公共品供给意愿的影响具有若干优势:第一,调查覆盖中国内地大部分省份,样本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同时也可以对不同地区的不同类型村庄^⑦进行更加细致的比较分析;第二,农村治理调查主要针对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问题,包含丰富的农村公共品建设、农民对社区治理的评价、农民公共品供给意愿等信息,便于准确识别转移支付收入对农民公共品供给意愿的影响程度以及深入挖掘当中的影响机制。

我们感兴趣的自变量是农民获得的转移支付收入,由问卷中的政府补贴和政府救济两部分相加而成。调研过程中发现,部分农民将农村养老保险收入填入了政府补贴部分,部分农民将农村养老保险填入了政府救济部分。由于本文的识别策略只需用到农民转移支付收入的变动,故将这两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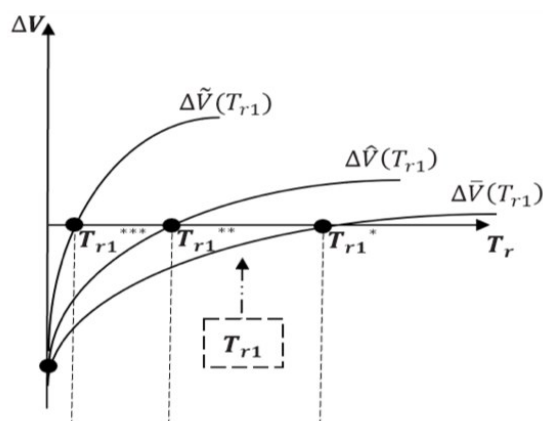


图1 机制分析图

分同时纳入感兴趣的自变量,从而避免低估农村养老保险的影响。因变量是农民公共品供给意愿,问卷中设置了问题“您是否愿意参与供给社区的公共品?”此处的公共品是各种类型公共品的统称,本文后续有通过对公共品分类来进行异质性分析。本文加入农民性别、主观生活水平认知和社区责任感等可能影响农民公共品供给意愿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并在实证中对比未加入控制变量和加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几乎一致地估计结果表明潜在的遗漏变量问题已经在RD设计中得到较好的处理。本文全部变量的具体定义和描述性统计详见附录表A1。

(二)识别策略

本文的识别利用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这一外生政策^⑧,政策规定参保人年满60周岁后可以按月领取养老金。政策实施时已年满60周岁的,直接认定为参保人并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但其符合参保条件的子女应当参保缴费;距领取年龄不足15年的,应按年缴费,允许一次性补缴;距领取年龄超过15年的,应按年缴费,累计缴费不少于15年。同时,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养老金的主要来源为基础养老金部分,而基础养老金部分完全由政府财政负担,这就意味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带有很强的公共转移支付性质。

为识别转移支付收入对农民公共品供给意愿的影响,我们首先利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设计的特点,采用模糊断点回归(Fuzzy RD)获得转移支付收入的外生拟合值,然后将农民公共品供给意愿直接对该转移支付拟合值进行回归。断点回归的基本思想是一个干预变量(D)完全依赖于一个参考变量(forcing variable, X)是否大于或等于某个阈值,假设其他可能影响结果的因素(Z)是连续的,那么当经济个体不能够完全操纵参考变量时,结果变量在断点处的跳跃就可以解释为原因变量的影响。根据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规定,只有年满60周岁成为老人,才可以领取养老金,但现实操作层面,是否领取养老金还受到其他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因此农民在60岁前后领取养老金的概率会从0上升跳跃到一个小于1的值,具体表达如下^⑨:

$$P[D_i = 1 | Age_i] = \begin{cases} g_1(Age_i), & Age_i \geq 60.5 \\ g_0(Age_i), & Age_i < 60.5 \end{cases}, \quad 0 = g_0(Age_i) < g_1(Age_i) < 1 \quad (15)$$

其中, Age_i 表示受访农民的年龄, D_i 为干预变量,此处指是否领取养老金,参保并属于老人则取1,否则为0。如果(15)式成立,则可以采用Fuzzy RD估计养老保险对农民转移支付收入的影响,进而获得农民转移支付收入的外生拟合值。Fuzzy RD估计可等价地视为IV估计,可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进行估计(Angrist and Pischke, 2009)。具体地,根据Imbens和Lemieux(2008)的建议,分别估计以下回归方程:

$$D_i = \beta_0 + \tau_0 T_i + \beta_1 Ac_i + \beta_2 T_i Ac_i + \beta_3 Z_i + \mu_i (|Ac_i| \leq h^*) \quad (16)$$

$$TRA_i = \gamma_0 + \tau_1 \widehat{D}_i + \gamma_1 Ac_i + \gamma_2 T_i Ac_i + \gamma_3 Z_i + \nu_i (|Ac_i| \leq h^*) \quad (17)$$

其中, T_i 指农民是否大于60.5岁,大于60.5岁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TRA_i 为农民获得的转移支付收入; $Ac_i = (Age_i - 60.5)$ 为农户年龄减去断点值60.5; h^* 为最优带宽; Z_i 为其他控制变量,包括:性别、生活水平认知和社区责任感,并在实证中对比未加入控制变量和加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几乎一致的估计结果表明潜在的遗漏变量问题已经在RD设计中得到较好的处理。通过对(16)式和(17)式分别进行最小二乘(OLS)估计,即可得到农民转移支付收入 TRA_i 的外生拟合值 $\widehat{TRA}_i$ 。

本文在RD阶段报告参数2SLS估计结果。在基准回归中,我们通过将样本限制在断点附近来进行局部线性回归,并采用Imbens和Kalyanaraman(2012)改进后的交叉验证方法计算IK最优带宽。

在第三阶段,为避免出现Forbidden Regression导致估计不一致的问题(Wooldridge, 2001; Angrist and Pischke, 2009),我们没有采用Logit或Probit这类非线性模型,而是采用线性概率模型(LPM),即用感兴趣的因变量 PG_i 对转移支付的外生拟合值 $\widehat{TRA}_i$ 进行回归,并采用OLS估计。具体地,第三阶段的回归方程可以表示为:

$$PG_i = \rho_0 + \tau_p \widehat{TRA}_i + \rho_1 Ac_i + \rho_2 T_i Ac_i + \rho_3 Z_i + \varepsilon_i (|Ac_i| \leq h^*) \quad (18)$$

其中, PG_i 指农民 i 的公共品供给意愿, $\widehat{TRA}_i$ 指农民转移支付收入的外拟合值,我们感兴趣的系数为 τ_p , 为保证估计的一致性,第三阶段采用与RD中相同的带宽。

五、实证分析

(一)图形分析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我们通过做图的方式直观地展现RD设计的合理性。图2描述了农民获得养老金概率与年龄的关系。从图2中可以看出,2018年年龄小于60.5岁的农民均未在2017年领取到养老金,而年龄大于等于60.5岁的农民则都以一定的正的概率领取到了养老金,这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政策规定相吻合,也印证了我们识别策略假设的合理性。图3展示了农民获得的转移支付收入与年龄的关系。从图中可以看出,由于养老保险政策的存在,农民获得的转移支付在60.5岁前后有一个明显的跳跃。图4^⑩为年龄的概率密度图。断点回归设计的合理性依赖于经济个体无法完全操控参考变量,即本研究中农民不能通过虚报年龄提前获得养老金。由图4可知,年龄在断点两侧的置信区间高度重合,即年龄分布在断点处连续,排除农民虚报年龄的可能性。

(二)基准回归与稳健性检验

图形分析只是给出一个直观初步的结果,精确的系数估计仍要以回归结果为准(Lee and Lemieux, 2010)。此外,我们感兴趣的是第三阶段的回归估计,RD阶段只是为第三阶段提供外生的转移支付拟合值。故后续的实证分析以回归分析为主,且主要聚焦于第三阶段转移支付系数的估计与检验。在以下各表中,Panel 1~Panel 3均分别对应于回归方程(16)~(18)。

表1报告了转移支付收入对农民公共品供给意愿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及相关的稳健性检验。第1列中,未加入控制变量,Panel 1和Panel 2显示,前两阶段关键变量的系数估计均正向显著,即年满60岁显著增加了农民获得养老金的概率,从而增加了农民的转移支付收入。在感兴趣的Panel 3中,农民获得的转移支付收入每提升1000元,农民愿意供给公共品的概率平均提升17.9%。第2列为加入控制变量的结果,前两阶段的估计结果基本不变,第三阶段估计系数变为15.8%,即农民获得的转移支付收入每提升1000元,农民愿意供给公共品的概率平均提升15.8%。第3、6列为安慰剂检验,分别将断点替换为37和73岁^⑪,并依然采用IK最优带宽,可以发现第3、6列中无论第二阶段还是第三阶段估计系数都不显著^⑫,说明了断点选择的合理性。第9列则借鉴Chen等(2013)的做法,将带宽扩大为IK最优带宽的两倍并加入年龄与断点之差的二次项、年龄与断点之差的平方与是否为老人的交互项^⑬进行局部多项式回归以检验断点的稳健性,Panel 1和Panel 2的结果都显示,RD的结果对不同带宽设定具有稳健性^⑭。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稳健性检验的第3、6、9列中的样本量与基准回归中第1列和第2列的样本量有差异,所以此处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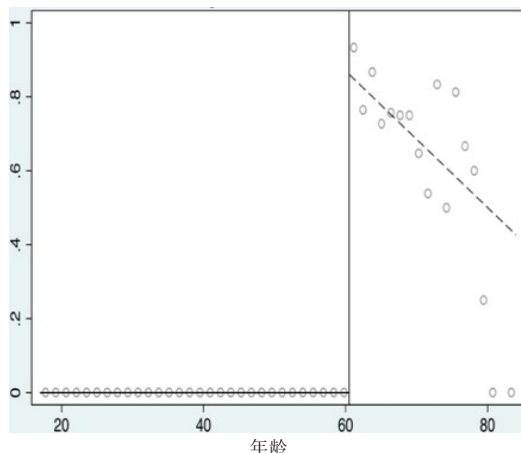


图2 各年龄领取养老金比例

注:竖直线表示年龄=60.5,为RD估计所采用的年龄断点。拟合线为获得养老保险的概率和转移支付收入对年龄的一次线性拟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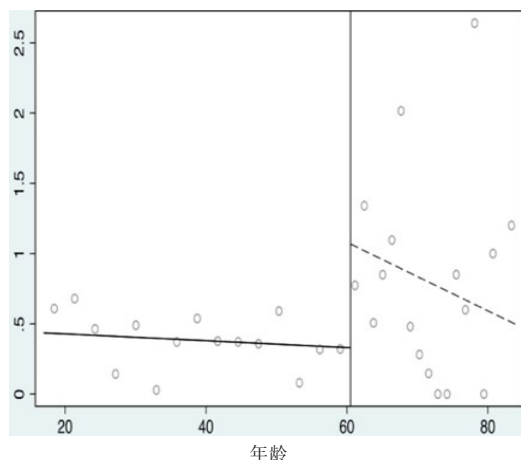


图3 各年龄领取转移支付(千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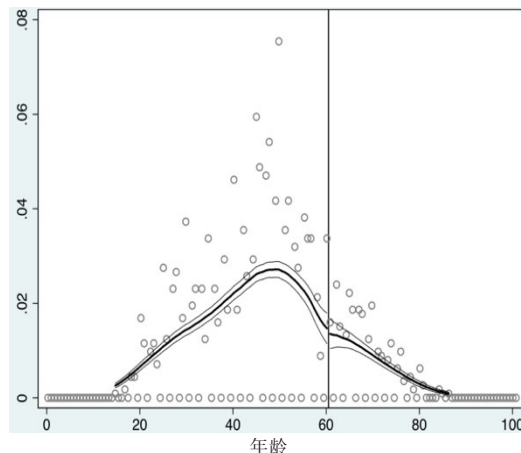


图4 年龄概率密度图

的稳健性检验结果有可能受到样本量的影响,但是有以下理由使我们可以排除这种可能性。第一,此处样本量的变动是我们采取的稳健性检验策略的必然结果,而非主观随意的选择样本。第3、6列中,我们将断点替换为37和73岁,而带宽保持为最优带宽不变,从图4可以看出人口年龄分布并非均匀分布,因此样本量必然发生改变。而第9列中我们保持断点为60岁不变,但将带宽扩大为1K最优带宽的2倍,这也必然导致样本量的增加。第二,第3列中在样本量增加的情况下,Panel 2的结果依然不显著,这实际上更加增强了此处安慰剂检验的可信度。此外,在第4和第5列中,我们放弃最优带宽而分别选择4岁和3岁作为带宽,相应的样本量减少到183和121,此时第二阶段估计系数依然保持不显著,与第3列结果一致。第三,第6列中的样本量虽然有所下降,但Panel 2中获得养老金的系数估计的t值仅有0.68,远远不足以达到显著的要求。此外,在第7和第8列中,我们放弃最优带宽而分别选择9岁和10岁作为带宽,相应的样本量增加到160和174,此时第二阶段估计系数依然保持不显著,与第6列结果一致。第四,第9列中由于将带宽扩大为2倍,导致样本量大幅增加,因此Panel 2中系数估计结果显著可能是受此影响。但我们也同时借鉴了Chen等(2013)的做法,加入了年龄与断点之差的二次项、年龄与断点之差的平方与是否为老人的交互项进行局部多项式回归,这一做法也符合Angrist和Pischke(2009)对于避免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造成的“虚假”断点的处理方法。总的来说,以上4点理由足以让我们无需过多担心RD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主要是受到样本量的影响,进而相信我们的识别策略具有合理性与稳健性。

此外,RD识别策略的合理性需要其他影响公共品供给意愿的因素在断点处连续。表2给出了相关变量在断点处的连续性检验,所有这些变量在断点处的跳跃均不显著。

(三)机制分析

1. 回归分析:厘清消费替代机制与信任补偿机制

在理论框架部分,我们综合考虑转移支付额度、乡村人情信任和农民消费,得到了3个命题。其中,命题3整合了命题1、命题2的内容,为理论部分的核心命题。故本部分将通过实证确定命题3中关键变量 T_{it} 的取值范围,进而厘清转移支付收入提升农民公共品供给意愿的作用机制。换言之,这部分将通过实证分析回答以下问题:转移支付收入能够促进农民供给公共品供给意愿,其原因是因为纯粹的收入增加而愿意消费私人物品以外的公共物品(消费替代效应),还是因为对村干部的信任与感激上升而出于报偿心理自愿供给公共品(信任补偿效应)。

表3第1列为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基准回归,作为机制分析的对照。基准回归的结果表明,转移支付能够促进农民公共品供给意愿,实证确定了 $T_{it}^{***} < T_{it}$ 。首先,我们在第2列和第3列分别引入农民对村主任和村书记的信任。Panel 3中第2列回归结果显示,控制住农民对村主任的信任度后,转移支付增加1000元对农民公共品供给意愿的提升效应从15.8%下降到14.1%,且农民对村主任的信任度显著地促进了农民的公共品供给意愿。

第3列Panel 3中回归结果显示,控制住农民对村书记的信任后,转移支付增加1000元对农民公共品供给意愿的提升效应从15.8%下降到14.0%,

表1 转移支付对农民公共品供给意愿的影响

	(1)	(2)	(3)	(4)	(5)	(6)	(7)	(8)	(9)
Panel 1: 是否获得养老保险(1st)									
是否为老人	0.807*** (0.095)	0.813*** (0.093)	0.557*** (0.118)	0.476*** (0.125)	0.355** (0.148)	0.819*** (0.124)	0.872*** (0.107)	0.881*** (0.109)	0.855*** (0.080)
Panel 2: 转移支付(2nd)									
获得养老金	1.360** (0.652)	1.612** (0.748)	0.589 (0.792)	0.487 (0.767)	1.447 (1.612)	-1.393 (2.051)	-1.953 (1.935)	-2.391 (1.880)	2.450** (1.102)
Panel 3: 公共品供给意愿(3rd)									
转移支付	0.179* (0.091)	0.158** (0.074)	-0.072 (0.149)	0.031 (0.221)	0.028 (0.104)	0.065 (0.091)	0.029 (0.067)	0.027 (0.054)	0.032 (0.032)
控制变量	No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高阶项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Yes
断点	60.5	60.5	37	37	37	73	73	73	60.5
样本量	160	160	226	183	121	114	160	174	369

注:(1)~(3)、(6)列带宽为1K最优带宽,只加入年龄与断点之差,以及是否为老人与年龄断点之差的交互项;(9)列带宽为2倍1K最优带宽。Panel 1~Panel 3分别对应于回归方程(16)~(18)。控制变量包括:性别、生活水平认知和社区责任感。括号中为村级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表2 影响公共品供给意愿的其他变量断点处连续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P值
Panel A: 已控制			
性别	0.18	0.11	0.11
生活水平认知	0.12	0.15	0.43
社区责任感	-0.07	0.20	0.73
Panel B: 未控制			
受教育年限	0.63	0.92	0.50
是否为党员	-0.09	0.09	0.30
是否为第一大姓	0.13	0.12	0.30

注:断点均为60.5。*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且该估计系数不再显著,而农民对村书记的信任度也显著促进了农民的公共品供给意愿。第4列中,我们同时引入农民对村主任和村书记的信任。此时,转移支付收入对农民公共品供给意愿的提升效应进一步下降为12.4%,且该系数不再显著。第2~4列的回归结果表明,控制住信任补偿机制后,转移支付的增加并不能提高农户公共品供给意愿,这说明消费替代效应尚未得以实现,故实证确定了 $T_{r1} < T_{r1}^*$ 。

接下来,我们在第5列引入弹性消费^⑤,回归结果表明,弹性消费本身对农民公共品供给意愿没有显著影响,这进一步说明了消费替代机制尚未得以实现。换言之,当前农民的私人消费仍严重不足,故将有限的转移支付收入 T_{r1} 投入到私人消费获得的边际效用仍大于将其投入到公共品获得的边际效用,因而转移支付收入无法通过消费替代机制促进农民的公共品供给意愿。此外,转移支付对农民公共品供给意愿的影响基本保持不变(从15.8%变为15.3%),并依然保持显著,这说明转移支付对农民公共品供给意愿的影响主要通过信任补偿机制发挥作用,故实证确定了 $T_{r1}^{**} < T_{r1}^*$ 。

最后,我们在第6列同时纳入农民对村主任的信任、农民对村书记的信任和弹性消费。回归结果显示,转移支付收入的系数估计与只纳入信任变量的结果相近,且均不显著。此外,农民对村主任的信任依然显著地促进了农民的公共品供给意愿,而农民的弹性消费对农民公共品供给意愿的影响依然保持不显著。该结果进一步印证了第2~5列的主要结论,即转移支付对农民公共品供给意愿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信任补偿机制实现,而消费替代机制尚未发挥作用。第7列将弹性消费换成总消费,作为第6列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与第6列基本一致,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机制分析结论的稳健性。

机制分析的结论回应了理论框架中的核心命题,并且实证确定了现实中平均转移支付 T_{r1} 的范围,即 $T_{r1}^{***} < T_{r1}^{**} < T_{r1} < T_{r1}^*$ 。当转移支付处于该范围内时,由命题3可以得出,转移支付能够提升农民公共品供给意愿,该供给意愿的提升主要通过信任补偿机制起作用,一旦控制住信任补偿机制,消费替代机制将不足以促进农民的公共品供给意愿。理论模型结合实证分析得出的上述结论符合当今农村转移支付绝对水平较低、农民私人消费远未达到满足的现实情况。此外,这一发现也实证补充了“出当今农村依然是一个熟人社会与人情社会,信任这一社会资本在公共品供给的集体动员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结论(周春生、汪杰贵,2012)。

2. 案例分析:对信任补偿机制实现方式的进一步探讨

上述机制分析虽然证实了信任补偿机制在公共品供给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但在现实中该机制如何具体发挥效果仍然值得进一步探讨。利用本次农村治理调查中各调研员针对调研村庄撰写的调研报告^⑥,我们可以为信任补偿机制的具体实现方式提供一些案例证据。

GL村的调研报告中指出,该村在2010年合并后面临“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的数量、质量不能满足合并后村民的需求”的问题。但是由于村书记和村主任“经验丰富,平易近人,与村民关系友好,切实为村民服务”,在两人的带领下,村庄于2017年已实现“村庄基础设施基本完善”。以该村2017年的一项道路项目为例,项目伊始,在村两委的争取下,“该项目获得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13.5万元”。此后,村两委召集全村村民进行筹款,村民们也纷纷响应,最终“村民自筹4万元,共计预算投资17.5万元”。该项目最终修建道路“长290米,宽4.5米,护砌280米,宽0.65米,高1.2米”。该项目的实施“解决了(GL村)YWL村民组40多户140人多年来的

表3 转移支付对公共品供给意愿影响机制分析
(信任补偿效应和消费替代效应)

	(1)	(2)	(3)	(4)	(5)	(6)	(7)
Panel 1:是否获得养老保险(1st)							
是否为老人	0.813*** (0.093)	0.812*** (0.094)	0.843*** (0.096)	0.844*** (0.097)	0.816*** (0.093)	0.847*** (0.092)	0.854*** (0.10)
Panel 2:转移支付(2nd)							
获得养老金	1.612** (0.748)	1.683** (0.766)	1.413* (0.75)	1.537** (0.786)	1.667** (0.735)	1.606** (0.785)	1.441* (0.79)
Panel 3:公共品供给意愿(3rd)							
转移支付	0.158** (0.074)	0.141** (0.069)	0.140 (0.095)	0.124 (0.085)	0.153** (0.072)	0.118 (0.081)	0.107 (0.096)
对村主任的信任度		0.159*** (0.045)		0.122** (0.059)		0.115** (0.046)	0.111* (0.061)
对村书记的信任度			0.126* (0.068)	0.056 (0.059)		0.059 (0.061)	0.045 (0.064)
弹性消费					-0.008 (0.008)	-0.007 (0.096)	
总消费							-0.001 (0.001)
样本量	160	159	139	139	159	139	125

注:均加入控制变量:性别、生活水平认知和社区责任感。断点均为60.5。所有估计的带宽选择采用IK 最优带宽Panel 1~Panel 3分别对应于回归方程(16)~(18)。括号中为村级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出行难问题”。据村民反映,道路的修缮“有效改善了生产生活条件,给自己带来了实惠”。由此可见,如果村民信任村干部,他们会相信村干部能为村庄保质保量供给公共品,因而更加愿意通过筹款等行动支持村庄公共建设。此外,村民对村干部的信任也会激发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他们会更加细致地了解村民的公共品需求,提出更符合村民需求的公共品建设方案,因而更容易获得村民的响应。信任补偿机制两种实现途径的示意图见图5。

CM村与GL村情况类似,虽然目前村庄公共品供给匮乏,但由于干群关系好,村民信任村干部,所以村民总体的公共品供给意愿依然很强。当村民被问及公共品供给意愿时,大部分村民均表示“愿意投身于公共产品的建设之中,也愿意为村庄公共品出钱出力”。而作为反面案例的SY村,情况则完全相反。村主任因在选举中存在“选票并未完全发放,而是留有一部分没发放”的舞弊行为而失去了村民的信任,“这种不信任最终大大降低了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积极性”。

总而言之,由于我国农村的特殊性和传统性,村庄内人情关系和联系的密切程度都远高于城市,农民在进行个人决策时不仅是一个“经济人”,更是作为一个村庄社会关系集合内的“社会人”,因而在当下农民普遍私人消费需求还未得以完全满足的情况下,转移支付能够克服以往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实现村民参与公共品供给意愿提升的关键就在于信任补偿机制。

(四)异质性分析

转移支付收入对农民公共品供给意愿的影响可能具有异质性。一方面,农民对不同类型的公共品的满意度和需求强度不同,因而投资和供给意愿也不同(李强等,2006)。另一方面,随着农村经济的市场化和农户独立经营主体地位的确立,由于资源禀赋不同,农户之间的差异在拉大。这种差异表现在受教育水平和生产结构上,农户之间的这些差异必然会引发他们对农村公共品需求的差异(林万龙,2007)。

表4检验转移支付收入对农民供给不同类型公共品的意愿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回归结果显示,转移支付会显著提升农民对社区卫生和社区绿化的供给意愿,然而转移支付并不会提升农民对交通设施和教育设施的供给意愿。可能的原因有:第一,目前的农村公共支出中,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生产性支出和基础建设支出占比过高,因此农民更倾向于供给目前缺口更大的生活性公共物品(沈坤容、张璟,2007)。第二,在农民的主观认知中,社区卫生和社区绿化是应当由私人负责供给的,而交通设施和教育设施则更多地应当由政府负责供给(岳书铭等,2005)。

表5检验转移支付对不同特征农民的公共品供给意愿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大体可以将中国农村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农村人口流出、留在村庄农民仍然从事传统农业的中西部农村地区,这些地区仍然保持了传统农村的主要特征;另一种是农村人口流入、村庄工业化程度很高,农民主要来自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贺雪峰,2017)。因此在村庄层面,我们将农民划分为沿海地区农民和非沿海地区农民、传统村庄农民和非传统村庄农民^⑩。第1列到第4列回归结果显示,转移支付对非沿海地区农民和传统村庄农民的公共品供给意愿有显著地促进作用。可能的原因有:第一,沿海地区的农村公共品供给依托于沿海城市已经较为完备,而非沿海

海村庄的公共品供给则相对不足。第二,非沿海地区的传统村庄中,人情往来更为紧密,信任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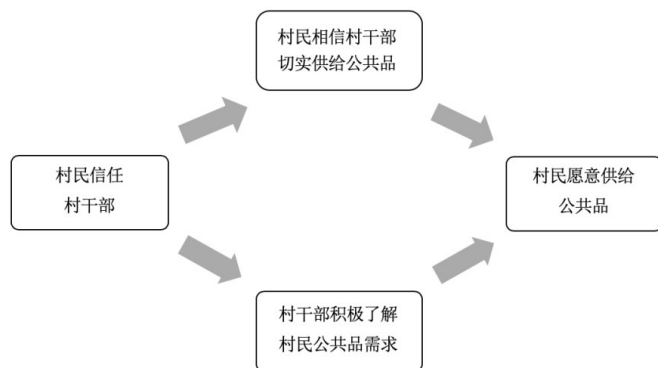


图5 信任补偿机制实现途径

表4 转移支付对不同类型公共品供给意愿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1)	(2)	(3)	(4)
Panel 3: 公共品供给意愿	社区卫生	社区绿化	交通设施	教育设施
转移支付	0.172** (0.076)	0.140* (0.084)	0.083 (0.076)	0.089 (0.08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151	151	151	143

注:断点均为60.5。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回归均同表1第2列Panel 1和Panel 2。所有估计的带宽均采用1K最优带宽。Panel 3对应回归方程(18)。控制变量包括:性别、生活水平认知和社区责任感。括号中均报告稳健标准误。*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非正式制度存续得更为完好,因而信任补偿机制更易发挥作用。

在个体层面,我们将农民按是否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以及是否主要从事农业劳动两个维度进行划分。第5列和第6列回归结果显示,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农民在获得转移支付后,对农村公共品供给意愿会显著提升。这与受教育水平会显著提升个体的公民意识,让个体更加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的研究结论一致(Dee, 2004; Milligan et al., 2004)。第7列和第8列的回归结果显示,主要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在接受到转移支付后,会显著地提升他们的公共品供给意愿。可能的原因有:第一,农民对农业生产依赖程度越高,则其对生产性公共品及其余的生活性公共品依赖程度也越强(刘蕾, 2016)。第二,以农业劳动为主的农民相较而言过着更加传统的农耕生活,更加认同传统的乡土人情关系,因而信任补偿机制更易起到效果(贺雪峰, 2013)。

六、结论性评述

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一级政府长期面临着财政困难的问题,因而尽管公共品供给不足已成为乡村治理中存在的一个突出的问题。但仅依赖于县乡财政提供农村地区的公共品供给显然不太现实,为推进农村公共品供给改革,提升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多元的公共品供给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多元公共品供给体系的核心就在于农民的自主参与。但目前而言,农民的公共品供给参与仍显不足。

针对这一现状,结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的政策背景,农民获得了日益提高的转移支付收入,我们感兴趣的问题就在于——农民获得的转移支付收入的不断提高,能否促进农民自发长效地参与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在公共品多元供给的角度上提高农村公共品的持续供给能力?本文利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通过RD-IV的识别策略,主要研究结论和有待提高的方面如下:第一,平均而言,农民从各级政府获得的转移支付每增加1000元,其愿意参与公共品供给的概率大约平均提高16%。第二,在目前整体补贴力度下,转移支付主要通过提高农民对于村委会的信任从而促进其参与公共品供给,剥离掉信任补偿机制的影响后,目前转移支付力度尚无法通过农民私人消费替代的机制促进其公共品供给。第三,以上结论主要针对60岁附近的参保老年人群体有效,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本文结论的可推广性,也是日后研究的提升空间所在。第四,出于识别策略的考虑,我们需要获得转移支付收入的外生变动,因此采用了养老金作为变动的来源。但是养老金只是农民获得的转移支付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提供转移支付的金额和方式与其他类型转移支付存在着差异,因而对农民公共品供给意愿的影响也可能具有异质性,由于目前我们尚没有发现更好的、更为一般化的农民转移支付层面的外生冲击,这也是本文为了识别因果而面临的局限性,在未来更为一般化的农民转移支付政策实施后,这一点或可以得到更好的改进^⑩。

在理论层面,本文的研究是对消费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的一个融合。一方面,商品消费中的收入效应是消费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公共品作为一种正常商品,本文的消费替代效应实质上就是探究公共品需求的(纯)收入效应^⑪。换言之,消费替代效应关注农民在获得转移支付收入后,其对公共品的需求是否会上升。另一方面,中国乡村作为一个关系型社会,社会关系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经济行为与社会行为,而社会资本理论是研究社会关系的常用范式。本文的信任补偿机制便是关注,由转移支付塑造的村民对于干部的信任这一社会资本,如何补偿村民原本因“搭便车”心理而导致的公共品供给意愿的不足。单独讨论收入效应或社会资本的较多,但本文利用转移支付收入的特殊性,在理论上构建模型分解了转移支付影响公共品供给意愿的消费替代效应和信任补偿效应,从而从农民“经济人”与“社会人”双重视角切入,拓展了有关研究的完备性,并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这是本研究相对于当前微观经济理论可能的创新之处。

本文的研究结论隐含政策意义为:首先,

表5 转移支付对不同特征农民公共品供给意愿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1)	(2)	(3)	(4)	(5)	(6)	(7)	(8)
	沿海地区		传统村庄		接受九年义务教育		主要从事农业劳动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Panel 3: 公共品供给意愿								
转移支付	0.078 (0.087)	0.753** (0.376)	0.310** (0.119)	-0.036 (0.117)	2.179* (1.267)	0.079 (0.065)	0.560*** (0.190)	0.005 (0.57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97	57	74	84	50	109	75	53

注:断点均为60.5。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回归均同表1第2列Panel 1和Panel 2。所有估计的带宽均采用IK最优带宽。Panel 3对应回归方程(18)。控制变量包括:性别、生活水平认知和社区责任感。由于回归(1)~(8)列中样本量较小,括号中均报告普通标准误。*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在基层政府财政普遍困难的当下,为乡镇层面的政府部门提供了一个公共品供给的新思路,即村级层面的公共品建设资金与对农民的转移支付资金之间的比例可能需要重新权衡,在考虑转移支付可以促进农民的公共品供给后,或许可以在财政支出中适当提高转移支付比例。那么也许在合理利用公共品多元供给渠道的基础上,可以在不减少村级层面整体公共品供给的前提下,提高农民的私人消费水平,实现帕累托改进。其次,由于信任在农民能否积极参与乡村公共品供给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乡镇政府除了按时足额公正透明地向农民发放转移支付之外,乡镇干部需要在日常工作中注意与农民群众的沟通与交流,建立起农民群众对自身的信赖感,从而在公共品建设的集资筹力过程中得到当地农民的积极支持。这也是在乡村治理的“三治”中,兼顾“法治”、“自治”与“德治”的体现。最后,当前各级政府对于农民的整体转移支付力度仍然不足,尽管农村保障制度为大部分农民已基本实现兜底,但日常弹性消费仍然存在较大的缺口,绝大部分农民还处于努力实现“独善其身”的阶段,而无法做到“兼济天下”。因此,完善农村民生保障、促进农民增收致富依然任重道远。

(作者单位:黄祖辉、刘炎周、胡伟斌,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公共管理学院;王雨祥,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管理学院。责任编辑:李逸飞)

注释

①数据来源:中国政府网 www.gov.cn。

②调研发现,绝大部分农民都通过村主任和村书记获知转移支付(如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信息、参与转移支付项目及领取转移支付资金。在各类社保的参保农民中,分别有78.44%和77.08%的农民由村主任和村书记告知并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③引入储蓄决策不改变本部分主要结论。

④ T_{it} 在本文的实证框架内即以养老金收入来刻画,它体现了农民在60岁附近的外生转移支付收入变动。

⑤赵宇、姜海臣(2007)研究发现,农村公共品供给质量差已经取代供给数量不足而成为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首要问题。现实中,村干部在公共品供给中更容易通过提供低质量的公共品而非降低公共品数量来谋取私利(Olken, 2007),农民对干部供给公共品的不信任更多的是质量层面而非数量层面,因此这里的 g 也可以从公共品的质量角度来理解。

⑥现实中,农村60岁左右的老年人向城镇流动情况相对较少,因而不考虑政府转移支付对其流动意愿产生影响,进而降低其公共物品供给意愿这一可能机制。此外,由于我们讨论政府转移支付,不会出现农民因为获得一笔政府转移支付而损失其他补贴导致总转移收入降低的情况,故这一机制也应该排除。

⑦调查村庄按照城(镇)中村、中心村、合并村、传统村进行分类。

⑧该政策前身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于2014年2月7日与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合并。

⑨调研时间为2018年,故我们收集的转移支付数据属于2017年,故取断点为60.5岁以排除在调研年份年龄为60岁但2017年未获取养老金的群体,避免估计偏差。

⑩年龄的取值范围15~86岁之内,有部分年龄的取值概率为0,这是因为部分特定年龄的农民未进入样本。该情况不会影响年龄的概率密度函数的估计,也不影响年龄在断点处的连续性检验。

⑪安慰剂检验的断点由基准回归断点(60.5岁)分别与年龄最小值(15岁)和年龄最大值(86岁)取平均值求得。

⑫第3列和第6列中,第一阶段均正向显著,这是因为小于37岁必然小于60.5岁,大于73岁必然大于60.5岁,这导致在3种不同断点设定下,“是否为老人”这个二元变量有大部分取值重复,故(3)和(6)中Panel 1的系数估计正向显著是合理的。

⑬即在回归方程(4)~(6)中,再加入控制变量 Ac_i^2 和 $T_iAc_i^2$ 。

⑭此处第三阶段不再显著。一方面,带宽的稳健性检验主要针对Fuzzy RD,即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OLS回归,故第三阶段显著与否不是我们此处稳健性检验关注的部分。另一方面,第三阶段不显著的原因,可能在于带宽扩大后,不同年龄带来的异质性无法被年龄二次项完全捕获,因而导致估计失效,当然也可能是RD设计的弱外部有效性所致。

⑮由于弹性消费的变动对收入提升更为敏感,更能捕捉消费替代机制,因而弹性消费更适合用来实证检验本文的理论预测。第7列将弹性消费换成总消费,实证结论基本保持不变。

⑯调研报告的引用均已得到相关调研员的许可,但本文文责自负。

⑰非传统村庄指城(镇)中村、中心村与合并村这3类新型农村社区。

⑱本文出于两方面考虑,没有直接探讨养老金对农民公共品供给意愿的影响。第一,在调研中,我们没有直接获得农民的养老金额度数据,而是获得了农民获得的转移支付收入数据。第二,相对养老金影响公共品供给而言,转移支付影响公共品供给是一个学术关注度更高、相关争论也更大的研究话题,我们对该话题进行研究的价值更大。

⑲公共品具有非排他性,一旦供给则所有人皆可对其消费,因而研究农民的公共品供给意愿实质也是研究农民对公共品的消费支付意愿。

参考文献

- (1)范逢春、李晓梅:《农村公共服务多元主体动态协同治理模型研究》,《管理世界》,2014年第9期。
- (2)范子英、张军:《转移支付、公共品供给与政府规模的膨胀》,《世界经济文汇》,2013年第2期。
- (3)傅勇:《财政分权、政府治理与非经济性公共物品供给》,《经济研究》,2010年第8期。
- (4)郭庆旺、贾俊雪:《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与地方公共服务提供》,《世界经济》,2008年第9期。
- (5)贺雪峰:《乡村治理现代化:村庄与体制》,《求索》,2017年第10期。

- (6)贺雪峰:《新乡土中国(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 (7)李强、罗仁福、刘承芳、张林秀:《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最需要什么样的公共服务——农民对农村公共物品投资的意愿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06年第10期。
- (8)林万龙:《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供求的结构性失衡:表现及成因》,《管理世界》,2007年第9期。
- (9)李燕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模式选择与绩效提升——基于5省93个样本村调查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2016年第11期。
- (10)李永友、张子楠:《转移支付提高了政府社会性公共品供给激励吗?》,《经济研究》,2017年第1期。
- (11)刘蕾:《人口空心化、居民参与意愿与农村公共品供给——来自山东省758位农村居民的调查》,《农业经济问题》,2016年第2期。
- (12)马晓河、方松海:《我国农村公共品的供给现状、问题与对策》,《农业经济问题》,2005年第4期。
- (13)亓寿伟、胡洪曙:《转移支付、政府偏好与公共产品供给》,《财政研究》,2015年第7期。
- (14)沈坤荣、张璟:《中国农村公共支出及其绩效分析——基于农民收入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经验研究》,《管理世界》,2007年第1期。
- (15)谢翌:《转移支付与公共品均等化分析》,《统计研究》,2007年第6期。
- (16)郁建兴、高翔:《农业农村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社会:一个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 (17)岳书铭、綦好东、杨学成:《基于农户意愿的农村公共品融资问题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5年第11期。
- (18)赵永辉、付文林:《转移支付、财力均等化与地区公共品供给》,《财政研究》,2017年第5期。
- (19)赵宇、姜海辰:《基于农民视角的主要农村公共品供给情况——以山东省11个县(市)的32个行政村为例》,《中国农村经济》,2007年第5期。
- (20)周生春、汪杰贵:《乡村社会资本与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效率——基于集体行动视角的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 (21)Acemoglu, D. and Robinson, J. A., 2001, "A Theory of Political Transi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1(4), pp.938~963.
- (22)Allers, M. A., 2012, "Yardstick Competition, Fiscal Disparities, and Equalization", *Economics Letters*, Vol. 117, pp. 4~6.
- (23)Angrist, J. and Pischke, J., 2008, *Mostly Harmless Econometrics: An Empiricist's Companion*,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4)Arrow, K., 1972, "Gifts and Exchanges",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Vol. 1, pp. 343~362.
- (25)Bardhan, P. and Mookherjee, D., 2006, "Decentralization and Accountability in Infrastructure Deliver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conomic Journal*, Vol.116, pp.101~127.
- (26)Baretti, C., Huber, B. and Lichtblau, K., 2002, "A Tax on Tax Revenue: The Incentive Effects of Equalizing Transfers: Evidence from Germany", *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 Vol.9, pp. 631~649.
- (27)Besley, T., Pande R., Rahman, L. and Rao, V., 2004, "The Politics of Public Good Provision: Evidence from Indian Local Governments",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2, pp.416~426.
- (28) Björkman, M. and Svensson, J., 2009, "Power to the People: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Field Experiment on Community-Based Monitoring in Ugand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24(2), pp.735~769.
- (29)Boadway, R. W. and Shah, A., 2007, *Intergovernmental Fiscal Transfers: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US: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 (30)Bucovetsky, S. and Smart, M., 2006, "The Efficiency Consequences of Local Revenue Equalization: Tax Competition and Tax Distortion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 Theory*, Vol. 8(1), pp. 119~144.
- (31)Chattopadhyay, R. and Duflo, E., 2004, "Women as Policy Makers: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Policy Experiment in India", *Econometrica*, Vol.72(5), pp.1409~1443.
- (32)Chen, Y., Ebenstein, A., Greenstone, M. and Li H., 2013, "Evidence on the Impact of Sustained Exposure to Air Pollution on Life Expectancy from China's Huai River Polic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 110(32), pp. 12936~12941.
- (33)Coleman, J. S., 1990,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34)Dee, T. S., 2004, "Are There Civic Returns to Educatio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88, pp.1697~1720.
- (35)Guiso, L., Sapienza, P. and Zingales, L., 2010, "Civic Capital as the Missing Link", in Benhabib, J., Bisin, A. and Jackson, M. O., eds: *Handbook of Social Economics*, San Diego: Elsevier.
- (36)Hindriks, J., Peralta, S. and Weber, S., 2008, "Competing in Taxes and Investment under Fiscal Equalizatio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92, pp. 2392~2402.
- (37)Hines, J. R. and Thaler, R. H., 1995, "Anomalies: The Flypaper Effec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9(4), pp.176~191.
- (38)Imbens, G. W. and Lemieux, T., 2008,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s: A Guide to Practice",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Vol. 142(2), pp. 615~635.
- (39)Imbens, G. W. and Kalyanaraman, K., 2012, "Optimal Bandwidth Choice for the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Estimator",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79(3), pp. 933~959.
- (40)Ivanyina, M., 2010, "Theory of Efficiency-enhancing Interjurisdictional Transfers", University Regensburg Working Paper Series.
- (41)Janvry, A. de, Finan, F. and Sadoulet, E., 2012, "Local Electoral Incentives and Decentralized Program Performanc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94(3), pp.672~685.
- (42)Lee, D. and Lemieux, T., 2010,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s in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48, pp.281~355.
- (43)Lizzeri, A. and Persico, N., 2001,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Under Alternative Electoral Incentiv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iew, Vol.91(1), pp.225~239.

(44)Miguel, E. and Gugerty, M. K., 2005, "Ethnic Diversity, Social Sanctions and Public Goods in Keny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89, pp.2325~2368.

(45)Milligan, K., Moretti, E. and Oreopoulos, P., 2004, "Does Education Improve Citizenship?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88, pp.1667~1695.

(46)Oates, W., 1972, *Fiscal Federal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47)Olken, B. A., 2007, "Monitoring Corruption: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Indonesi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15(2), pp.200~249.

(48)Olson, M.,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49)Putnam, R. P.,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50)Shih, V., Liu, M. and Zhang, Q., 2005, "Eating Budget: The Logical of Fiscal Transfers under Predatory Fiscal Federalism", FED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FE20050009.

(51)Tsai, L. L., 2007, "Solidary Groups, Informal Accountability, and Local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01(2), pp.355~372.

(52)Weingast, B. R., 2009, "Second Generation Fiscal Federalism: The Implications of Fiscal Incentive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Vol. 65, pp. 279~293.

(53)Wooldridge, J., 2001,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Cross Section and Panel Dat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54)Xu, Y. and Yao, Y., 2015, "Informal Institutions, Collective Action, and Public Investment in Rural Chin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09(2), pp.371~391.

附录

表 A1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公共品供给意愿:是=1,否=0	1600	0.57	0	1
转移支付收入(千元):2017年从政府获得的补贴救济与保险赔付之和	1458	0.92	0	100
是否获得养老保险:是=1,否=0	1657	0.11	0	1
是否为老人:年龄大于60.5岁,是=1,否=0	1657	0.18	0	1
性别:男性=1,女性=0	1635	0.59	0	1
生活水平认知:1为比同村村民低很多,5为比同村村民高很多	1635	2.94	1	5
认为农民供给公共品是义务:1为非常不同意,5为非常同意	1603	3.41	1	5
认为村主任关心村庄公共品建设:1为非常不同意,5为非常同意	1634	3.58	1	5
认为村书记有能力:1为非常不同意,5为非常同意	1416	3.64	1	5
弹性消费(千元):2017年衣着支出,文娱支出和保健支出之和	1657	4.57	0	170
总消费(千元):2017年总支出	1390	50.71	0	825

=====

(上接第81页)

(40)Li, Q. and Wu, Y., 2018, "Intangible Capital in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es: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51, pp.323~341.

(41)Marrano, M. G. and Haskel, J., 2006, "How Much does the UK Invest in Intangible Assets",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Working Paper, No.578.

(42)Nordhaus, W. D., 1996, "Do Real-Output and Real-Wage Measures Capture Reality? The History of Lighting Suggests Not", in *The Economics of New Good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27~70.

(43)OECD, 2012, "Second Task Force on the Capitalization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National Accounts", OECD Working Paper, No.STD/CSTAT/WPNA(2012)29.

(44)O'Mahony, M. and Vecchi, M., 2003, "Is There an ICT Impact on TFP? A Heterogeneous Dynamic Panel Approach", NIESR Discussion Papers, No.219.

(45)Roth, F. and Thum, A. E., 2013, "Intangible Capital and Labor Productivity Growth, Panel Evidence for the EU from 1998~2005", *Review of Income & Wealth*, Vol.59(3), pp.486~508.

(46)Solow, R. M., 1987, "Review of the Nature of Economics, by Jane Jacobs", *New York Times*.

(47)Van Ark, B., Hao, J. X., Corrado, C. and Hulten, C. R., 2009, "Measuring Intangible Capital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Growth in Europe", *European Investment Bank Papers*, Vol.14(1), pp.62~93.

(48)Young, A., 2003, "Gold into Base Metals, 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e Reform Period",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11(6), pp.1220~1261.

Consumption Substitution or Trust Compens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on Transfer Income and Villagers' Supply Willingness of Public Goods

Huang Zuhui^{a,b}, Wang Yuxiang^{a,c}, Liu Yanzhou^{a,b} and Hu Weibin^{a,b}

(a.China Academy for Rural Develop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b.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Zhejiang University;
c.School of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Summary: Since the 21st century, the amount of transfer to rural area in China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but the public goods supply there remains severely insufficient. The government-leading pattern of public goods supply neglects the positive role played by villagers in financing public goods and matching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public goods, so this pattern doesn't work well.

Villagers are the direct beneficiaries and important participants of public goods supply, so it is theoretically possible to study the insufficiency of rural public goods supp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llagers' public goods supply willingness. However, villagers neither have the ability to share the expenses of supplying public goods because of their low income, nor have the motivation to shoulder the burden of supplying public goods because of the loss of mutual trust in rural. In recent years, as Chinese government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people's livelihood, the united pension system, medical insurance system and subsistence security system are gradually implemented and promoted, which greatly increases the transfer income of villagers. In this situation, villagers' transfer income raises both their income and their trust in village cadres, relaxes their ability constraint and motivation constraint in supplying public goods, and thus may eventually promote their willingness of public goods supply.

Thus, this paper tries to study and solve the insufficiency of rural public goods supp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llagers' public goods supply willingness. Particularl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wo questions. For one, does the villagers' transfer income improve their willingness of public goods supply? For another, through what mechanisms does the villagers' transfer income improve their willingness of public goods supply? Theoretically, we build a model to decompose transfer's impact on villagers' supply willingness of public goods into consumption substitution effect and trust compensation effect. Consumption substitution effect means that villagers may prefer supplying and then consuming public goods because their marginal utility from private goods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income. Trust compensation effect means that villagers may promote their trust in village cadres during the course of cadres' informing villagers of transfer and granting villagers with transfer. Through this decomposition, we regard individual both as economic man and as social man, which is a supplement of existing microeconomic theory and enhances the completeness of study.

Empirically, using Rural Governance Survey (RGS) 2018 data, we make use of the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endowment insurance policy to construct RD-IV identification strategy and test our theoretical predictions.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bability of villagers' being willing to supply public goods grows about 16% with their transfer income increases by 1,000 Yuan and that such promotion is almost all from trust compensation mechanism. Moreover, the positive effect of transfer income on villagers' willingness to supply public goods is more substantial and significant for those lived in inland regions or traditional villages, received 9-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and engaged in agricultural work.

This paper makes two main contributions. On the theoretical level, this paper builds a model to analyze the mechanisms of transfer income's impact on villagers' supply willingness of public goods and then empirically estimates these two effects, which enriches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ies of rural public goods supply in a micro level. On the realistic level, this paper connects rural transfer income and public goods supply, so our conclusions may have some policy implications on solving the insufficiency of rural public goods supply.

Keywords: transfer income; public goods supply; consumption substitution; trust compensation

JEL Classification: F328